

当代社会认同的特征、逻辑与发展趋势^{〔*〕}

姚德薇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全球化与网络化浪潮推动当代社会变迁,既深刻改变了社会物质生活面貌,也深刻影响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认同状况。个体的自我身份深度分裂、人机界限受到人工智能技术挑战而威胁自我认同的统一性,群体身份认同碎片化、消费文化异化阻碍社会认同的整合性。从长时段上看,社会认同发展经历认同整合、分化和再建构的逻辑过程。当前现代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历史进程方兴未艾,中国社会变迁持续深入,当代社会认同仍将处于调整状态,一方面继续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另一方面网络化也为实现新的社会认同整合提供基础。

〔关键词〕社会认同;认同分化;认同整合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0.017

一、引言:(社会)认同是一个现代问题

21 世纪以来,当代世界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带动世界 1/3 以上的人口进入快速发展状态。互联网技术获得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和信息沟通等重要领域逐渐取代传统模式介质,成为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全球化与网络化浪潮推动当代社会变迁,既深刻影响了社会物质生活面貌,也深刻改变了思想意识的社会认同。

所谓社会认同,是近些年来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频繁使用的理论词汇。早期创始人泰弗尔(Tajfel)从社会心理学角度,

将之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1〕}这个界定确立了认同概念的社会性,认同并不是某种纯粹的内在心理现象,而是本质上与群体相关。从广义上说,所有认同都是社会性认同。社会学对社会认同概念的认识和使用,更多注重其受到社会规范、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方面。^{〔2〕}代表性的定义,如李友梅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3〕}郑杭生将之界定为“就是个人和群体对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就是以利益为基

作者简介:姚德薇,社会学博士,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认同分化与整合研究”(13BSH036)的成果之一。

点,以文化为纽带,以组织为归属,在多种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和群体对其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4]新旧世纪交替之机,围绕认同而展开的对国家、民族、组织、身份、价值观等方面的研究大量勃兴,使得社会认同这个起初用于解释群际心理的理论,被广泛用于对普遍社会现象的考察。

认同或社会认同是一个现代问题。在前现代社会,认同的起点被认为在人的自身之外,人们根据宇宙、理念、上帝或者天、道等来确认自己,而现代认同的起点却是在人自身之中,人们到“自我”这里寻求认同。前现代社会中,作为认同起点的上帝、天等因素具有外在于人的永恒性特点,建立丰功伟业、获得显赫地位等是早期认同的终极目标;而在现代社会,认同从“自我”开始,人们追求那些被认为能够体现主体性、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可是,人生的意义、人的本性之类是没有固定标志物的,随着人们理解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说还有什么比较确定的地方,那就是人类永远失去了永恒的生活方式。因为内在的自我没有边界,主体性也没有终点,现代认同注定只有暂时的目标和永远的追求。

现代化推动社会认同问题凸显。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0年,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步入总体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均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导了新世纪的方向。由工业化、城市化等引领的我国现代化迅速推进,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成就卓著;与此同时,社会分化明显,社会心理、社会认同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来看,以“中国知网”为例,“认同”主题下的论文在1983年、1984年仅有1篇,2000年有201篇,2010年有3321篇,2017年更是达到7238篇的高峰。此外,以“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职业认同”“价值认同”“组织认同”等为主题的论文,每每都在1000篇以上。

本文基于社会学的视角,重点探讨社会认同

在当代社会的特征表现、内在发生逻辑和未来趋势,以期对认识当代社会生活的精神层面有所帮助。

二、当代中国社会认同的特征表现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社会分化加快导致利益分化加剧,原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认同不能统摄分化的利益追求,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博弈或冲突的现状背后是社会认同的根基发生了动摇。无论人们是否明确自觉到认同,也无论人们从哪个角度定义和理解认同,都不能否认认同感是一种“身份感”和“意义感”,以及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发生差异和产生影响。现代语境中的社会认同,受网络技术和现代文化的极大影响,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特征,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较为突出:

(一)多重自我认同困惑

当“上网”成为人们每天的工作与生活日常时,网络中呈现出的自我状态,在衡量自我认同同时获得了重要权重。在网络上,一个人可以根据交往的需要和个人意愿,决定加入哪些网络社区或社交群体,设立多少个自我,以及是否采用实名或匿名,愿意或渴望以何种符号性形象展示自己。也就是说,可以任意规定自己的身份。人们在网络上设定的身份是一种符号性设定,它游离于真实个体,并不需要和现实身份之间形成一一对应,可以为其他人以设定者的名义加以使用甚至盗用。以不同人格或身份自由“翱翔”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在“放飞”的同时离开了现实生活的“地面”,带来多种新问题:网络自我的多重化与现实自我的唯一性形成“多与一”的矛盾,“他人”在网络上以“我”的名义出现形成“他与我”的矛盾,轻易离开现实规则规范约束的自我在网络社会中体验或深陷某种境界,进而威胁到现实社会角色的正常扮演,等等。一个人的自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稳定性和整体性,也不再以某种固定的形象呈现给他人,变成一种非稳态的、可撕裂、拼凑和涂画的东西。失去了稳定的

根基,自我的大厦支离破碎,“它不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5]

(二) 群体身份认同脱位

网络社会具有去中心化结构、信息共享性质和沟通过滤性特质,它将人们从现实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用自己设定的某种身份开展网络交往,形成不同于现实群体的各种“网络社群”。这种网络实践会动摇现实社会明确固定的社会角色及其隶属关系,网络空间对传统在场空间的嵌套性存在,越来越成为支配个人时间、吸引个体关注的主要因素,正在瓦解传统社会中群体所具有的稳定身份认同,使其碎片化,群体对此状况却是无能为力。处于多重属性群体中的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脱离了原位。^[6]网络为人们克服地域障碍,进行自由交流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但是现实社会中较为固定的身份地位藩篱却难以轻松跨越。尽管人们意识到这种差别,却依然渴望将自己的身份多重化,群体认同所具有的归属和支持作用表现不足。

(三) 人工智能技术挑战人机界限

由实体的人所承载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智能化时代却要成为问题了。自我认同和社会(或集体、群体)认同是认同的两个层面。自我认同聚焦于人的内在性,体现人的反思性理解,是人对自身意义感、价值感的反思,其依据是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承担。社会认同则注重人在特定群体中对群体或社区的文化、价值、信念方面的共识性态度,思考的层面是人的行为所具有的普遍社会意义。

由“深度学习”引发的人工智能技术,使一些机器能够完成“类人”任务,实现特定领域内的“人机交流”。如果说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潜意识理论摧毁了人类对自身理性的坚定信念,拓展了自我研究的疆域;那么,基于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人工智能技术则直接挑战人与机器的界限。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1997年,由美国IBM公司开发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打败俄罗斯国际象棋冠军卡

斯帕罗夫,“人类尊严”被人类创造的工具击溃,引发“人类造物与自身关系”的世纪末大讨论。^[7]然而,这只是“人机对弈”中人类表现逊色的开始。2016年美国谷歌公司开发的机器人AlphaGo击败韩国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再次引发“人类命运”热议。^[8]人类终于承认机器相比于人脑在计算速度上更胜一筹。2017年美国微软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被设定为“16岁少女”——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9]“她”在央视综艺节目《机智过人》^[10]中表现突出。通过逐步升级完善,小冰越来越像个“人”,^[11]大大突破了“情感”这个人类为机器设定的禁忌和“底线”。更有甚者,2019年,美国Neuralink公司公开“脑机接口”技术实验进展,声称其目标是“帮助人类更快速地直接让大脑与机器沟通”。^[12]

除智能机器人之外,全息影像、基因编辑等其他科学领域也纷纷爆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研究结果。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潜力几乎无限,不能不让人感到人类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和命运的不确定性,人及其自我的定义、人与物(机器)的关系、技术自我与生理自我之间、新的代际关系问题以及社会伦理准则等,都面临解构和重新建构、释义的挑战。

(四) 消费文化的异化认同

消费文化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消费文化的盛行冲击了认同,造成了消费异化现象。消费行为原本是满足生活必需品的基本需求,工业社会中形成的巨大生产力,逐渐创造了一个“富裕社会”,但是现代消费文化却通过各种手段鼓励、诱使人们过度消费,通过消费塑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鼓吹用消费展示所谓的个性。然而,喜新厌旧的消费行为只能使人得到短暂满足,作为“物”的消费品终究不能填补现代人瞬息万变的“感受”空虚,反而帮助消费逻辑深入到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

盲目消费或异化消费,冲击着认同的现实性;而消费过度追求个性化、私人化,则威胁到自

我的同一性。用不断消费来显示自我的存在感,其实是降低了自我的精神内涵,将自我丰富的内在向度浅薄化、表面化。外在之物只是内在向度的有形化表露,因此只能代表了一部分自我,而无法穷尽全部的自我,这就注定了消费文化的异化命运。以“物的占有为中心”^[13]的消费文化,必然远离真正的自我。需要与不需要、真需要与假需要、内在需要与外在标签等混杂在一起,使人在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海洋里难以认清自我的本性。不断被挑起的消费欲望和转瞬即逝的消费满足感之间,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自我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被严重撕裂。更为潜在的危害是,沉溺于个性化的消费容易使人陷于私人空间,从而不知不觉地从公共社会生活中抽身,而离开了他者认可的认同,其对自我的定位就会出现

三、社会认同的内在发展逻辑

认同是一个可进行多层次理解的概念,自身包含着分化的潜质。在社会角色的层面上,认同就是人们根据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确定角色内容及与他人的关系,遵循社会规范对角色的一般要求,避免因违背规范而得到“污名”的危险。在社会互动的层面上,认同涉及到个体对角色、身份、关系等状态的动态建构和评估判断。认同本身就是社会中的认同,只有通过社会互动,在角色实现中学习、扮演规范期待才能形成。历时性地看,“认同事实上只能理解为过程,理解为‘成为’或‘变成’。”^[14]认同是一个不断获取的动态过程。一个凝固的认同身份只能存在于特定关系的特定阶段,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经历的增加和环境的变化都会让认同的内容有所损益。吉登斯将认同看成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因关系变动而不断寻求意义稳定性的过程。

社会认同作为体现社会心态的一种主观社会认知,其产生原因和社会影响具有现实性。社会生活基础条件变化,推动根植于其上的社会认同发生变化,社会生活变迁的节奏快慢、幅度大

小则影响着社会认同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在变迁缓慢的时代,认同作为“基础背景”或“意义的来源”不被特别关注;而在变迁剧烈的时代,认同作为“焦虑感”或“无意义感”影响人们精神层面的感受和表现。从长时段上看,社会认同发展经历认同凝聚、分化和再整合的逻辑过程。

(一) 民族国家的社会认同凝聚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认同由分散走向凝聚的过程。

在古代和中古时期,人们生活在部落、城邦、王国等各种不同的共同体中,认同的对象可能是宗教信仰,也可能是王朝家族,或者是某种政治秩序。即便是这些认同对象,也会因为地理上的分散居住、社会等级的隔离而显出内部的差异性,这种认同很难形成更大的规模。取代狭隘的血缘和地缘认同的,是以系统宗教为主的跨文化、跨地区社会认同,特别是以“儒教”^[15]、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主的世界性宗教,将认同的对象指向内部结构严密完整的宗教,使地域、血缘的分割能够被统一的精神纽带所联系,如穆罕默德复兴和巩固的伊斯兰教国家和遵奉基督教为国教的后期罗马帝国,都是政教合一的帝国。中国自秦汉以来直至清朝,王朝家族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秩序是社会认同的主要依据。

随着宗教和封建体制束缚的打破,传统的认同失去支撑基础,逐渐弱化,出现以民族国家认同为目标的新社会联系纽带。民族国家认同与传统认同的最主要区别在于,无论是宗教认同还是王朝认同,都十分强调广大民众对权威的顺从,侧重于认同的义务方面,将人们定位在社会秩序的差别性意义框架中;民族国家认同强调的是所有社会成员在新共同体内的相似性,侧重于认同的权利方面,将所有人对认同感的确认作为维持整合的条件。

以“公民权”和“人民”这两种现代认同的核心概念为例,可以看到民族国家认同的整合机制。在传统的疆域国家范围内,中央与边疆的区分不仅是地理的,还是政治的、心理的和文化的,

远离中央权威同时意味着认同的疏离,“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种状况。而在现代领土国家范围内,虽然也存在地理、心理、政治和文化上的实际差别,但是“边疆”已被“国界”所取代,并具有了仅次于中央的政治地位,是需要“捍卫”的地方。在现代民族国家里,获得国民身份的来源是国家,主要标志是“公民权”或“人民”称谓的获得与体现。二者与一个人的肤色、年龄、能力、出身等个别性、特殊性的品质无关,而与法律上的认定和政治判断有关。“公民权”使法律身份超越了地方血缘和宗教身份。^[16]

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假设基础上的“公民权”,以选举政治和自由市场原则构成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在彻底战胜封建制度之后,发展出社会福利制度,以使部分在社会竞争中失利的弱势国民在失去宗教、血缘关系的有力庇护后,能够从国家的再分配系统获益。格罗斯针对“公民权”的分析认为,与族属意识、族籍身份相比,国民身份认同突破了种族联系和地域联系的束缚,从而能够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联系。^[17]

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作为建立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核心理念和制度。“人民”代表着最广泛大众的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在逻辑上是比“公民权”有更高一层境界的概念,除了国民身份认同的内涵之外,还有对社会主义社会新制度、新文化的认同,追求和实现更高理想的发展认同。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时间不长,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外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国家认同的失败。苏联在其后期发展中出现许多错误决策,造成政治认同与利益认同、制度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相互冲突抵牾,最终出现认同严重分裂、国家解体的后果,其教训非常深刻。

(二) 全球化和社会认同分化

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发展速度加快,资本、劳动力和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性增强,新的社会主体和运行方式出现,民族国

家曾经用来建构社会认同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以往曾经有效的、传统的社会认同整合机制受到了挑战,社会认同危机出现。卡斯特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之二《认同的力量》中指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18]他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不是人类社会自发形成的,而应当被理解为是西方各国政府用新自由主义加以推进的“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结果。由此,就可以理解全球化的多面性后果。它不仅引起世界经济秩序的新变化,造成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或紧密,而且也冲击甚至剥夺了广大社会下层成员的利益,激起各民族基层社会成员的不满和愤怒,形成了抗拒性的集体认同,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向外散播,实现了穿越传统社会制度的横向连接,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冲击全球化秩序的各种大规模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等。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驱动力不是传统类型的国家,而是由财富、技术和权力所组成的网络,在大幅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文化创造力和通讯能力的同时,它们也削弱了社会组织的权威。原先高度依赖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制度性组织,跟不上历史节奏加快的步伐,无法控制计算机网络中的抽象化权力,现存的社会控制机制和政治表达机制面临效率降低甚至部分失效。这种态势让人们感到越来越不知所措。“反全球化”运动以不同寻常的形式和不可预期的方式发生。

1994年,墨西哥爆发的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运动,旨在抗议其对本地脆弱的农业经济的摧毁性负面影响。通过对电子通讯手段、录像带、计算机通讯手段的利用,这场运动被散播到全世界,帮助形成有利的国际公共舆论运动,从而从舆论上防止政府采取大规模镇压行动。

2001年,“基地组织”策划和发动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代表另一种反全球化的极端运动。“基地组织所依据的认同原则,其特色在于它是宗教认同的一种地域性表达方式”。^[19]它涉及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圣地、穆斯林土地和

任何穆斯林居住的地方的不可侵犯性。

本土权利、反贫困阵营、女性权利、社会权利、环境主义、劳动权利等等,都可以作为反全球化运动的来源。把这些诉求综合起来,就可以看

到全球化被认为是“不公正”的一项事业。曼纽尔·卡斯特详细考察了几项主要的反全球化运动,并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了运动里的各种要素。如下表所示:

表1 反全球化运动的价值观和信念结构

运 动	认 同	敌 人	目 标
萨帕塔主义	受压迫的、被排斥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	全球资本主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非法的革命制度党政府	自尊、民主、土地
美国民兵	本土的美国公民	新的全球秩序、美国联邦政府	公民和地方共同体的自由和主权
奥姆真理教	信徒献身的精神共同体	联合世界政府、日本警察	大灾难中的获救
基地组织	真正的穆斯林	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全球强权	作为乌玛的人类、用教法统治的社会
反全球化运动	多元认同	全球公司资本主义	全球民主

资料来源:[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卡斯特认为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意味着反叛全球新秩序的意义,它已经把自己从起初的多元认同的、抗拒现实的运动,转变成一场围绕全球民主政治方案而组织起来的运动。

(三)未来社会认同再建构

反全球化运动显示出重新构建社会认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它建立在否定公司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价值的基础上。

现代民族国家是地缘格局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体,物质性存在是其基本标志,边境线内的合法定居者是其保护和治理的主要对象。对于国土境内的居民来说,民族国家的存在首先是其保障安全、抵御侵犯的依靠,其次,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设置使国家运转起来,处理内部矛盾,确立民族文化价值观,促进社会整合。而在经济全球化情形下,经贸往来与生产经营活动的跨国跨地区发生频繁,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超越,或者变得模糊不清,似乎在国家边界内剩下的,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了。这个时候,国家与其居民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和平的威胁”。^[20]

民族国家对内部事务的主权管理是国家认同的依据,国家制定、人们参与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行为是各种认同内容的具体化。然而,跨国公司、跨境金融以及互联网的出现,使国家面临失去控制的困境。鲍曼在其《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中问道,“民族国家之后是什么?”经济是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现在却受制于全球金融市场,经济活动同政治行为日益分离,以及经济利用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等方法摆脱了政治的行政干预,结果造成了作为有效代理的政治权力的丧失,政治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却几乎要沦为大公司的保安部门,于是形成“主权就名存实亡,权力来源不明,其中心空无所有”^[21]的奇特局面。国家似乎正在失去其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完全自主性。然而,即使我们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国家,却还是居住在同一个领土边界内,该如何定义社会?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是否还有共同的边界?现代民族国家面临国家观念的危机,不论对上述问题作何回答,都是对未来社会认同的再建构或重塑。

四、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趋势

认同问题或认同困境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正是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其所依靠的工具主义理性、自我实现的价值理念,把人的认同置

于现代性漂浮的汪洋大海之上,承受浮浮沉沉的命运。目前,人类现代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历史进程方兴未艾,社会认同也必然映照人类生活的明暗。中国社会变迁持续深入,当代社会认同仍将处于调整状态。辩证地看,社会认同的发展趋势可从分化与整合两大方面去分析。

(一) 社会认同在网络社会中继续分化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现代化的时期不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间更是短暂,但是它们掀起的变革却是一次比一次强劲、彻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伴随认同根基和道德价值观的转换;全球化加速了超越空间限制的人类互动与交往,把不同的人类文化带到一起,也把平等和不平等同时带到彼此的生活世界中;网络化既在深度上,又在广度和速度上,加快上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并内在的改变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后果。

网络通讯的即时效应,强化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偌大的世界在“信息高速公路”的联结下,如同闲庭信步一样唾手可得。可是联系越紧密,蕴涵的潜在危险就越大。在时间与空间关系紧密的传统时代,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确定范围,是地方认同稳定性的保障,是意义共同体的边界。然而,现代性全面分离了时间和空间,把社会信任交给陌生人的专家系统,把真理放在怀疑的旗帜下,这从根本上置共同体于永恒的“未完成”状态之中。

在时空分离和网络技术条件下,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启”对过去事件的讨论,这使得任何过去的事情都有可能“复活”,成为“当下”的关注。在“脱域”机制条件下,地域影响对人们的限制缩小了,人们对之给予的关注也相应削弱了。与之相反,距离遥远的他处发生的事件却可以及时获悉,仿佛就是发生在身边不远处一样,使人产生亲近感,引发大量关注和回应,进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加上时空分离、事件“脱域”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能够促使人们对周遭环境里的事物及其变化,产生对比心理和

理想化要求,并以此评价自己所在群体或部门、地区的政策做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或不信任感。

网络社会持续向深发展,加剧了社会分化形成的价值观分歧,使本就面临危机的国家认同感弱化。虽然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可以突破国界、地域的限制,但是不同信息携带的价值观取向却因地域、文化、历史的不同存在差异性,信息交流的过程,也是不同文化与道德标准之间出现分歧、矛盾的过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宗教信仰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总的来看,无论是微观层面上的个人日常生活,还是宏观层面上的民族文化价值观,都存在因为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而引起的分化。

(二) 社会认同在新共识基础上整合

互联网新科技的发展,加速了社会交往频率,同时也制造了数字鸿沟,扩大社会差距,使人们认识到求得更大范围精神层面的社会认同十分困难。同时,迅速扩张的网络社会要求人们正视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全面审视现代认同所具有的新特点,而不是一味地否定批判。网络社会启发人们思考如何在新技术条件下建构一种全新的认同模式,实现社会的融合发展。

首先,应该积极肯定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人类的前进。原本受到传播介质的限制,或者政治国家的控制而不能为公众知晓的一些社会问题、社会不公正,经由互联网而公开曝光,在数量巨大的公众关注下,有助于问题的恰当解决。同时,网络空间的流动特性,以一种快捷可行、低成本高质量的方式,便于不同势位的人们之间形成对话,有利于不同立场冲突利益之间的协商,有助于促成“头脑风暴”,创造新认识、新理念,建设新世界。网络化社会也是信息社会,信息的顺畅流动是信息社会的活力源泉。当代社会网络化、信息化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其所创造的产值之巨和参与人员、从业人员之多,

已经到了不可估量的地步。而任何开历史倒车的企图都不会获得成功。就像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后,失去的“美好事物”不会原样重现,只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新的精神家园。

其次,自下而上的新型共识^[22]对社会认同整合具有建构作用。传统共识通常是自上而下的,由社会管理者或精英人士根据特定信念、价值观和认识水平,演绎出一套规则和制度加以推行。由于缺乏形成共识的广泛基础,其实现的执行成本比较高,需要借助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和威权制度,还有可能遭遇非正式规则(潜在规则)的抵抗和消耗,损失执行效果。互联网信息平台基于使用者视角采取的平等原则,为自下而上的共识路径提供了技术支持。后一种类型的共识来自基层社会,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更大程度上反映社情民意,只要借助政府行为的“东风”,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网络空间起初建立时,“平等”“对话”就是其不言自明的规则,网络上通过对话或辩论达成的共识,是一种基层群众的社会认同,是一种主动建构的社会认同,它包含了网络群体成员共有的价值评判、利益追求和行动取向。

再次,促成“公域”守法、“私域”自律的多元化宽容性社会认同新机制。^[23]网络社会虽然具有高度匿名性和灵活性,但其并不是法外之地。如果任由非主流言论、分裂声音等无序发展下去,则无从保障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和谐稳定秩序。坚持用法律约束“公共领域”的言行,确保宽松的舆论环境不会演变为无限制的、无原则的纵容,不允许违反公共秩序的举动发生。而在“私人领域”的范围内,要倡导道德自律、行业自律。一个真正有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网络空间,依赖于每一位成员对整体利益的自觉维护。网络社会在瓦解传统认同基础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制造了多元、宽容与秩序的虚拟社会认同新景观。

五、结论及讨论:从社会认同看社会整合

社会生活网络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交往

全球化加深,中国现代化发展加速,都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认同深刻变迁。稳定的认同主体和参照群体、认同的内容和认同发生的环境、认同分化的广度和速度,都出现了以往时代难以企及的变化。

首先,虚拟与真实、想象与实有的缠绕交织,使自我认同呈现多样化的面貌,个性化张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相对于户籍系统中人们的真姓实名而言,一个人在网上的昵称可以以任何形式呈现,如符号、图片,以及数字、字母、动植物、历史人物、虚构的人或事等。其次,改革带来的体制机制调整和利益变动、城市化造成的迁移和社会流动,重塑不同层次和范围的群体认同。人们赖以定位自身的归属群体处于变动之中,工作、学习、随迁等原因都会使人离开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地域,割舍或淡化原有的群体认同,并不得不尝试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群体认同。再次,基于代际差异、群际差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等而形成的社会分化促成亚文化广泛传播,虚假不实信息也乘机滋生蔓延,误导社会心理,加剧社会认同的分化。“佛系”“丧文化”“燃系”等风格不同的亚文化各自拥有一部分人群。发达的网络社交在制造开放性沟通的同时,也容易使人陷入“信息茧房”或“回音壁效应”之中,造成重大的公共议题被排除在个人偏好和兴趣之外,从而有损于社会共识的达成。

如果仅从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认同是一个局部性概念,用以解释复杂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心态,描绘社会关系的现代特征。然而,全球性经济政治秩序变迁背景下,地缘国家的社会认同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学问题。那些依据不同学科领域和操作范围的政策决策、经贸往来、利益分割以及话语论题,最终在个人和群体这里,汇集或化合为可感可述的认同,成为个人和群体指导自身行为、评判他人行为的价值准则。这种力量既可以是众志成城,也可以变成撕裂社会的利刃。社会认同分化不过是社会分化的一个表征,它体现的是社会分化的逻辑在

人们身心感受上的合理性程度。因此,社会认同是一个与社会整合有内在关联的概念。

社会整合并不等于否定社会分化,相反,任何故意压制分化、不承认分化的话语及行为在当代社会都不会获得哪怕只是暂时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的化解可以条分缕析、精准明确,社会价值观、社会心态却显得难以捉摸、把握不定,被抑制的话语和行为只是转移到别处而已。所以,有序分化和可控分化才是社会整合目标下的良策。而如何引导分化的社会认同走向社会整合,以缩减社会发展代价,增进全社会的福祉,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议题。

注释:

[1] Henri Tajfe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2] 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3]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3-174页。

[4]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9·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5] Sherry Turkle, *Life on the Scre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p. 261. 转引自王成兵、吴玉军:《虚拟社会与当代认同危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6] 吴冠军:《中国社会互联网虚拟社群的思考札记》,《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2期。

[7] 《历史上的今天,IBM深蓝超级计算机击败国际象棋世

界冠军》,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31176382_100170370。

[8] 《人机大战结束:AlphaGo 4:1击败李世石》,腾讯网,https://tech.qq.com/a/20160315/049899.htm。

[9] 《人工智能“小冰”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46181710_445078。

[10] 《机智过人》是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科学挑战节目,以智能科技与人对弈和互动的形式,展现和检验人工智能。

[11] 刘景丰:《微软小冰这五年》,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246463。

[12]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设备真的来了 最早明年人体试验》,搜狐网,http://www.sohu.com/a/327458026_100191017。

[13] [英]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14] Richard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5] 关于儒家思想是否能够被称为“儒教”,学术界一直存在异议。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或者说,取其最宽泛的理解,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起到类似于西方宗教的功能。这里之所以采用“儒教”的说法,是为了在文中指出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同等的话语地位。

[16] [17]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4、75页;转引自吴永红:《分化与整合: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认同》,《学术论坛》2008年第5期。

[18] [19] [美]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18页。

[20] 因为这种来自外部的干预,不是以战争的形式,而是基于互惠、密切的经济往来。但是,与经济全球化伴生的,是民族国家原先发挥作用、保存价值观的固有前提受到了威胁。

[21]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5页。

[22] [23] 参见王成兵、吴玉军:《虚拟社会与当代认同危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